绪　论

1937年到1945年，是中国的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是近代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抗战的胜利，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它提高了中华民族在国际上的声望，开创了一条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打败帝国主义强国的道路，加速了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的进程。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重庆人民对抗日战争的贡献》是全套丛书中带有总结性质的一本，它涉及到的理论问题比较多。在绪论中，我们就有些重要的问题，如重庆与抗战的关系、重庆人民与抗战胜利的关系、重庆与四川的关系、重庆发展与抗战的关系、抗战时期重庆人民概念的界定等等，以及本书的框架体系和研究价值，作如下阐述。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一、重庆与抗战的关系

重庆与抗战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提起抗战人们就会想到重庆，尤其是年龄大一点的人更是这样。这是为什么呢？这主要是因为重庆在抗战时有着特殊的地位。“七·七”事变后，日本大举进攻中国，上海失守，南京危急，迁都问题迫在眉睫。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宣言，决定迁至重庆办公。随着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国民党党政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大多数的金融机构、工商业以及文化新闻机构等都陆续迁往重庆。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发布通令，正式定重庆为陪都。此后，重庆遂成为战时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的中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由单独对日作战，变成了中、美、英、荷、澳等国联合对日作战。根据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提议，将亚洲太平洋地区划分为四大作战区，其中的中国战区统帅部便设在重庆。这样，重庆则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各种力量的结合地，成为西太平洋地区反法西斯战争的军事指挥中心。重庆也因此由四川东部的一个普通城市变成一座国际名城。重庆地位的上述变化，使重庆在抗战中发挥了其他城市所不能替代的作用。研究抗战，就必然要研究重庆与抗战的关系。

二、重庆人民与抗战胜利的关系

中国抗日战争经过八年苦战最后获得胜利，这决不是偶然的。过去，曾有人认为中国抗战胜利的决定性因素是美国在日本投下了两颗原子弹；或认为苏联出兵东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些看法都是片面的。应该说，这两个因素对于中国抗战的胜利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决定性的力量则是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抗日战争

的胜利，是中国人民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团结抗战，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无畏牺牲，用自己的鲜血和身躯换得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性因素。八年抗战的胜利，是中国人民团结抗战的结果。

抗日战争的胜利，重庆人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重庆人民在人力、物力和财力等方面，对抗战作出的贡献均居全国之首。随着重庆地位的变化，重庆人民的历史责任也加重了。重庆人民不是像抗战前那样以地区性人民的身份参加抗战，而是以首都人民的身份参加抗战。重庆工人生产了大批枪支弹药送到前方，制作了3亿米布匹的军服，生产皮靴10万多双，制作军用皮件80万套。每月生产柴油3万吨，机油三、四万加仑，供应文化用品28470吨。每日生产面粉7万袋。生产军粮是重庆农民所承担的一个艰巨而重大的任务，青壮年农民都上前线了，只剩下老弱妇孺参加生产劳动。重庆农民共捐粮食84 438 748石，占国统区的1/3。重庆人民不仅保证了军粮的供应，还保证了内地厂矿职工、大中小学校的师生以及政府工作人员的口粮。

重庆人民还从人力、财力上支援抗战。以人力论，川军几十万人上前线。据不完全统计：

川军战死者	263991人
负伤者	356267人
失踪者	24025人
总计	646283人

此外，还不断补充兵员上前线。以财力论，据粗略统计，以重庆为中心的四川，共担负了4400亿元，占全国财政总支出的1/3。

重庆人民还有一个特殊的任务，就是保卫首都的安全，保卫战时指挥中心的正常运转。在敌机连续轰炸的情况下，重庆人民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完成了这个重大任务。此外，重庆人民以大无畏的牺牲和奉献精神，承担着东南沿海一带内迁重庆的人民

住、吃、穿、用等一系列问题。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如果没有重庆人民的重大贡献，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因此，研究抗战，也必然要研究重庆人民的贡献。

三、重庆与四川的关系

谈到重庆人民对抗战的贡献，不可能不涉及整个四川。也许人们会问：谈重庆人民的贡献，为什么有些内容又涉及到了整个四川呢？因为任何事物都是互相联系的，并不是孤立地存在和发展。蒋介石国民党之所以定重庆为陪都，决不是用孤立的眼光来看重庆，而是把重庆放在整个四川、大西南，乃至全国的范围来考虑它的战略地位的。

四川素称天府之国，人口众多，物产丰富。而重庆不仅是控制全川的重镇，而且是扼西南的门户。从地理、政治、经济的角度来讲，四川居祖国心脏地带，重庆则是这一战略后方中举足轻重的中心点。重庆以其特有的地理优势，历来成为四川和西南的工商业重镇和战略要地。以交通运输而论，重庆的水路运输较为发达。重庆地处嘉陵江与长江的汇合处，它凭借长江及其支流岷江、沱江、乌江和嘉陵江组成了水上运输的网络。重庆内通四川盆地各处，外联长江中下游地区，南来北往，东下西上，甚为方便。再以战略地位来看，重庆东通荆襄，南达云贵，西连四川大部，北接汉中，又有大巴山脉和三峡天险作为天然屏障。乾隆简志云：全蜀四塞之险甲于天下，故渝城进攻退守，坐安和会。重庆的战略地位，便于首脑机关运筹帷幄，因而历来成为兵家必争之地。1940 年 9 月 6 日，国民政府在定重庆为陪都的通令中说：“川省人民，同仇敌忾，竭诚纾难，矢志不移。树抗战之基局，赞建国之大业。今行都形势，益臻巩固。战时蔚成军事政治经济之枢纽，此后更为西南建设之中心。”通令已将重庆和四川的关系

表述得很清楚了。可以说，重庆乃四川之中心。因此，研究抗战，研究重庆人民对抗战的贡献，是不能简单地将重庆与四川截然分开的。

四、重庆发展与抗战的关系

抗战前的重庆是一个内陆城市，是西南最大的工商业城镇。工业与沿海相比确实是较为落后，但在西南各省中又比较先进。重庆居长江、嘉陵江汇合处，为工业用水提供了充足的水源。两江流域蕴藏着丰富的资源可供开发利用。重庆四周的广大农村土地肥沃，可以供给日用品生产原料和生活用粮。正是这些地理条件，加上重庆人民的勤劳与奉献，才使重庆在八年抗战中能承受巨大的负担，对抗战作出杰出的贡献。

重庆人民在支援抗战中，使重庆自身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重庆的综合实力较战前也大为增强。正是重庆这种综合实力以及全国的综合国力的增强，才有力量去支撑八年抗战，所以重庆的发展与抗战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重庆在抗战期间各个方面的发展，从以下几个数据便可见一斑 ：

类别	抗战前	抗战中
人口	48万人	124万人
工厂	30多家	400多家
银行	14家	80家
大专院校	2所	22所

重庆大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适应了抗战的需要。抗战需要表现在前方的军需和后方的民用两个大的方面。国际支援对重庆的发展，也有一定的作用。抗战的需要必然刺激生产的发展，而重庆人民出于爱国热情，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重庆经济发展的客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观条件，在于沿海一带民族工业内迁以后，他们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先进设备，充分利用重庆地区的丰富资源，适应抗战的需要进行生产，使重庆经济得以迅速发展。重庆本地的原有工业，也充分利用了沿海一带先进的工业技术和人才，积极进行工业改造和挖掘潜力，使本地经济也有了大的发展。此外，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在抗战建国的口号下也在一定程度上鼓励、支持各种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这是重庆经济发展的原因之一。

由于沿海一带文化机构内迁重庆，文化界人士会聚重庆。在抗战的推动下，重庆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也日益发展起来。

由于民主党派纷纷云集重庆，在抗战时期开展了广泛的抗日民主运动。在提高民族意识、民主意识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促进了民主政治的发展。

由于重庆在抗战时期的发展，不仅支持了抗战，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重庆成为现代化城市，尤其是为重庆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重庆在战时是国民政府的陪都，在抗战中成为一座国际名城。在新时期，重庆人民将继承优良传统，发挥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特殊作用。因此，研究抗战，还应该研究抗战对重庆发展的作用。

五、对抗战时期重庆人民概念的界定

本书所说的抗战时期的重庆人民，不仅是指长期居住、生活和工作在重庆的本地人，还指抗战八年期间，从国内外，从四面八方为了抗战而来到重庆的人。因此，重庆人民的范畴相当广泛，它包括本地人民和外来重庆参加抗战的人民两个大部分。

毛泽东指出：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人民的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抗战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

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根据毛泽东给人民和敌人所作的界定，我们可以看到，凡是抗战时期生活、工作、战斗在重庆地区的人，除了汉奸和亲日派之外，都可以称为抗战时期的重庆人民。从这种意义上来说，重庆人民包括了各民族、各阶级、各社会集团、各党派团体以及各方面人士，是抗战时期一支强大的抗日力量。

抗战时期的重庆人民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抗战时期，重庆作为陪都，是抗战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的中心。重庆是全国人民团结抗战的一个中心，是中华民族大团结的象征。不仅重庆本地人对抗战作出了贡献，外地来重庆的人也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因此，讲述重庆人民对抗战的贡献，必须把上述两部分包括进去，以体现历史的真实。也只有充分肯定他们的贡献和功劳，才更有助于中华民族的大团结。

根据以上认识，我们在撰写本书时，所论及的重庆人民从阶级来讲，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要求抗日的大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中的开明人士；从党派来讲，包括中国共产党、国民党的抗日派和民主派、各民主党派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从民族来讲，包括国内各民族以及海外归国侨胞。此外，还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所有关心、支援抗战的其他各方面人士。上面所述的重庆人民，本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知识的出知识原则，从各方面对抗战作出了最大的努力和贡献。

六、本书的框架体系与研究价值

本书共七章，可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章是本书的第一部分，主要论述重庆在抗战时期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从一个地区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上升成为全国抗日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由于重庆地位的变化，重庆人民所承担的历史责任，也从地区性上升为全国性，其贡献的价值和所起的作用也就不是局部性而是全局性的了。这部分为以后各章论述重庆人民的贡献奠定了论证基础，创设了条件。

第二章到第五章是本书的第二部分，这部分以丰富，翔实的史实，分别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全面叙述了重庆人民对抗战所作的杰出贡献。这部分是本书的核心和主体，旨在说明重庆人民的抗战，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抗战，重庆人民以无私的奉献精神对抗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七章是本书的第三部分，通过前面大量史实的论述，揭示出重庆人民作出如此重大贡献的精神支柱是什么？其精神的内驱力何在？爱国主义是重庆人民抗战的精神支柱，是重庆人民自觉参加抗战，无私奉献和牺牲的内驱力。揭示出这一点，是本书的主观意图和研究价值所在，这也是本书的生命力所在。

本书是一部史书，但又不完全是史书，而是一部史论结合的学术专著。本书看似一部地方史，实则不是。因为重庆抗战不是地方性的，而是全国性的。因此，本书是研究中华民族抗战史的学术著作。本书的现实价值在于，它是对全国人民、特别是对青年一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精神武器和历史教材。抗战时期重庆人民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永远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时期，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重庆人民的光荣传统，争做一代具有远大理想、勇于创新的新时期的重庆人，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第一章
重庆地位的变化和重庆人民的历史使命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由一个地区性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一跃而为中国战时的陪都，成为全国抗日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外交的中心；由四川东陲的一个普通城市上升成为一座国际知名城市；由一个古老的商业城市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基础的城市。由于重庆地位的这一变化，重庆人民的地位也随之提高，处于首都人民的地位。抗战时期，重庆人民肩负着重大和艰巨的历史使命。

一、重庆地位的变化

1. 抗战时期的政治中心

重庆原名江州。“州”，即水中可居的高地。因重庆地处两江汇合，三面临水，一面接陆，形如半岛，故称“江州”。后来重庆更名为恭州。南宋光宗赵惇因他曾先封为恭王，后登帝位，自诩为双重喜庆，遂将恭州更名为重庆，并升格为重庆府。重庆迄今

已得名800多年。

古城重庆，历史悠久。在历史上，重庆曾三次作过国都。第一次是公元前十一世纪的巴人，定重庆为国都，史称巴国。到公元前三一六年秦师入蜀，巴国被秦所灭。第二次是元代末年的农民起义领袖之一的明玉珍于1363年在重庆建立大夏国。他改元天统，在重庆即帝位四年后死去。他的儿子继位， 1371年为明朝所灭。第三次就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策定四川为抗日根据地和复兴民族的根据地，于1937年 7月将国民政府移驻重庆， 1940年 9月 6 日明令定重庆为国民政府陪都。

抗战前的重庆，是西南的一个最大的商业城市，是西南物资转运站，是西南的经济中心。那么，重庆为什么被选作抗战的陪都呢？除了重庆特殊的地理位置、自然资源外，人的因素应该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就地理位置来说，重庆地处长江与嘉陵江汇合之处，襟带双江，控驭南北，素有“天险”之称，因而适宜于战争中易守难攻的地势需要。从物产资源来看，四川素有“天府之国”的美称，特别是煤、铁、石油等战略物资较丰富，能保障战需品的供给。此外，四川的人口对抗战有特别的意义。

毛泽东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是人，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战争双方力量的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心和人力的对比。据此，四川人口多，能够给予战争所需要大量的兵力和后勤部队以源源不断的补充。况且，四川人的革命性极强，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在辛亥革命时期，四川的保路运动就成为武昌起义的直接导火线。抗战爆发后，四川人民的抗日热情很高。川军主动请缨出川抗战；四川人民欢迎和支持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沿海一带迁渝的工厂，对他们征地办厂实行优待政策，准免收附加税三成，以后又减为五成，并且对其工作、生活提供各种方便条件。重庆人民的热情和好客，是重庆成为各种抗日力量聚会地的一个重要条件。

总之，四川重庆具备了争取抗战胜利的各种有利条件。孙中山说过，中国可以作为国都的地方有两个，一是广东，一是四川。在抗日战争时期，四川定都优于广东，因为广东地处海口，而中国的海防力量十分薄弱，敌人的海军随时可能侵入。四川则远处边陲，地势险要，敌人的兵力不易深入。重庆以四川天险作屏障，以西北、西南两大国际路线作依托，与西南各省联系密切，是选作国都的好地方。因此，国民政府定重庆为战时中国的首都。

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之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工农兵学商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抗日团体、各社会阶层的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广泛参加的一次全民族抗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团聚了全民族的力量，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重庆渐成抗战的政治中心。 1939年 1月，中国共产党为了更好地与国民党合作抗战，在重庆建立了中共中央南方局，作为中共在国统区的派出机构。

随着抗战政治中心西移重庆，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相继云集重庆。沿海一带的民族资本家，也纷纷迁川到渝，民族资本家会聚重庆。西南地方实力派，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也纷纷转向抗日。海外侨胞，出于对祖国的热爱，也先后从国外来到重庆参加抗战。西南地区是少数民族较为集中的地方，不少少数民族人士也来重庆支持抗战。此外，重庆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各方面人士以及世界上同情和支援中国抗战的友好人士，他们战斗在重庆这块热土上，为中华民族的抗日斗争奉献热血。

总之，抗战时期的重庆，不仅成为国民政府指挥抗战的政治中心，而且成了各种政治力量的集会地，重庆政治中心地位的确立，对于中国人民取得抗战的胜利，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2．抗战的军事指挥中心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抗战时期，中国的抗日战场分为国民党担负作战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担任对日作战的敌后战场。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重庆不仅成为国民党的政治指挥中心，也成为国民党军事指挥中心。国民政府在正面战场的相持阶段和反攻阶段组织的多次对日作战，都是国民政府军委会在重庆指挥和领导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统一战线形成。中国由过去单独对日作战变成为中、美、英、荷、澳等26个国家联合对日作战。1942 年 1 月 1 日，26个反法西斯战争的国家在美国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规定签字国保证互相支援，运用全部军事力量与经济资源，打败法西斯轴心国及其仆从，形成以中国、美国、苏联、英国等为核心的国际反法西斯联盟。根据罗斯福的建议，将亚洲太平洋战场分为四大作战区，其中中国战区包括中国本土、越南、泰国、缅甸、马来亚和印度等地。统帅部设在重庆，蒋介石任战区司令官，罗斯福派史迪威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中国战区准备了10个军的兵力，开赴缅甸等地抗战。中国战区在打败法西斯侵略战争中占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1941年底，日本兵力是240多万人，其中用于中国战区的有130 多万。这就是说，中国人民抗击和钳制着日本总兵力的一半以上。因此，重庆也成为指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中心地。

中国的抗日战争还有一个重要战场，就是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敌后战场成为抗日的主要战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又编成第十八集团军。蒋介石同意共产党在重庆设立十八集团军办事处，重庆便成为国共两党合作，共同指挥对日作战的地方。当然，中国共产党指挥对日作战的中心是延安。

3。抗战的经济中心

抗战前的重庆，工业基础 较差。具有现代规模的工厂为数不多，如重庆电力公司、民生实业公司、重庆炼铁厂等。当时我国

的工业基地主要在上海。抗战爆发后，开始了我国工业的迁建运动。沿江沿海一带的工厂面临沦入敌手的危险，许多爱国人士和民族资本家，纷纷要求国民政府资助，把工厂迁到内地各省，尤其是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比较优越的重庆。国民政府为了抗战的需要，对这次大迁移实行了鼓励与支持政策。四川省、重庆市当局和人民群众表示了热忱的欢迎和支持，一些开明人士也积极配合。当时的复旦中学校长颜伯华将猫儿石祖地200余亩，以优惠价格售于龙章、天原、天盛等内迁工厂。在这次工厂的大迁移中，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对民营厂矿的内迁给予了大力协助，迁入重庆的民营厂矿有234家，占内迁民营厂总数的51.7%。迁入重庆的工厂大多数来自上海，一般规模较大，设备较好，技术先进。一时间，重庆南岸、江北、沙坪坝、九龙坡、市中区以及长寿等地烟囱林立。例如，渝鑫钢铁厂、合作五金厂、顺昌机器厂、天原化工厂、国际标准铅笔厂、裕华纱厂、中国毛纺织厂、中国火柴原料厂等，到1939年1月，在重庆竣工生产的内迁工厂有50多家，1941年达100家左右。这一大批企业内迁，大大加强和充实了重庆的经济实力，成为重庆工商业经济乃至全国经济的主导力量，初步奠定了抗战经济的中心地位。

其次，东南亚华侨集资兴办的企业，成为抗战时期重庆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重庆抗战经济中心的形成占有突出地位。如陈嘉庚等组成的华侨归国慰问团集资创办、以生产奎宁和时令药品为主的重庆制药厂，以菲律宾华侨秦望山、叶松生在长寿创办用电解方法生产电石等产品，以马来亚华侨王振相、王全兴、庄怡生等组织创办的中国橡胶厂等。中南橡胶厂，为了满足大后方交通运输所需轮胎，从1940年成立到1945年抗战胜利，共产轮胎4万只左右，解决了新胎进口难、轮胎磨损无法补充的困难，并从产胎到生产胶鞋、胶底、胶布、雨衣、皮碗、水管和汽车内外胎以及各种机器汽车配件，还先后开办七个橡胶厂。中南

橡胶厂在归国华侨发展民族经济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再次，重庆工业合作运动在抗战的新形势下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工人们自己筹资、购置机器，自己生产，自己管理，生产收入归自己。这是一种自助自救的新的工业经济形态，它的出现，弥补了大工业生产的不足，有利于改善人民的生活和支援抗战。

总之，在抗战时期的重庆，由于沿海一带工厂内迁来渝，东南亚华侨集资在重庆办厂，工人合作工业经济的产生这三支经济力量与重庆民族经济的汇合，使重庆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形成为抗战时期的经济中心。1938年到1942年是重庆经济的大发展时期,被称为中国战时的‘工业之家”。

4．抗战的文化教育中心

抗战前，重庆仅有两所高等学校，学生数量只占全国高校人数的2.8%，在校学生不及全国总数的1%。中等学校20所，占全国总数0.62%。职业学校7所。私立小学20所,占全国的0.05%。由于战前重庆经济落后，受经济制约的文化教育也必然落后。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重庆成为政治和经济的中心，反映在文化上，重庆也发展成为文化教育中心。抗战开始后，大专院校迁入重庆的就有48所，占国统区108所高校的44%。新闻机关、文化团体，也先后迁来重庆。大批文化界人士，特别是一些知名人士也纷纷云集重庆，重庆成了中国文化精英的荟萃之地。

国共合作后，国民党邀请周恩来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聘请从日本回国抗战的文化界知名人士郭沫若担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领导下的第三厅，肩负着抗日的宣传重任，他们招贤纳士，安排了一大批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作为文化宣传的核心力量，并通过这些人去广泛团结更多的文化界人士。

抗战时期，郭沫若发起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邀请周恩来任名誉会长。文协成立后，在重庆等地开展了大量的

抗日宣传活动。如举办大型讲演会，邀请国共两党和其他知名人士讲演抗战形势与前途；举行学术讲座；组织各种演出活动，如戏剧演出、以历史为题材的话剧演出；举办西南四省戏剧展览会，歌咏比赛，诗歌朗诵；音乐晚会等。这些活动，活跃了整个重庆的文化生活，增强了重庆的抗日气氛，也标志着文化界在抗战的旗帜下结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

抗战时期重庆的文化界，不仅仅面向山城，而且走向农村，深入敌后。当时，第三厅组织了 9 个抗敌宣传演出队、 4 个抗敌宣传队、 4 个电影放映队和 1 个孩子剧团。同时还成立了战地服务和慰问总会，在各地设立简易图书馆、书报供应处，还创办民众学校。一批批文艺工作者、新闻记者奔赴前线，深入兵营、战壕，深入农村，面向农民。街头剧、街头诗、抗战电影、救亡歌曲普及社会。这些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文艺活动，成了教育人民和广大战士最强有力的精神武器。通过文艺宣传，提高了人民和战士的民族意识，增强了抗日的信心和决心。

第三厅撤销以后，又成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郭沫若担任主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主要以文艺形式继续宣传抗日。

在八年抗战中，由于大批文化工作者从四面八方来到重庆，使重庆成为抗战时期的文化中心。抗战文化紧密配合抗战时期的政治和军事，密切联系抗战实际，从人民的需要出发，开展了大量的、丰富多彩的活动，大大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民族意识，增强了团结，激发了抗战热情，成为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文化界在抗战活动中自身也得到很大的发展，出了一大批人才，出了一大批优秀文化成果。整个山城重庆，呈现出一派进步和光明的前景。

5．抗战的外交中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德、意、日法西斯侵略者为一方，以先后参战的中、苏、美、英等61个国家为一方，共同抗击法西斯的

侵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重庆成为亚太地区反法西斯战争的指挥中心，是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各种力量在远东的集合地，也成为抗战的外交中心。

抗战期间，美、苏、英、法、波、荷、比、西等30多个反法西斯战争的国家在重庆设有使馆，有40多个国家在重庆建有外交关系。重庆还成立有反法西斯战争的各种国际性组织，如“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中国分会”“国际宣传委员会”等。重庆还有10多个中外文化协会，如中苏文化协会、中英文化协会、中缅文化协会、中越文化协会等。据1943年10月重庆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抗战时期常驻在重庆的外国人员就有1129人。其中，英国人最多，达329人。其次是美国人，有168人。苏联也有163人。这些外国人中，有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医务、教育、商业等各方面的人士，尤以军政要人为最多。此外，各国使者来渝、世界知名人士来渝、群众团体来渝者，也是不计其数。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区指挥中心在重庆设立，西方各方面人士来渝访问者更为频繁。他们中既有政府官员、也有一般职业军人和文职人员，还有著名作家、新闻工作者、医务人员。

为了争取国际援助中国的抗战，国民政府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取得了重大成效。1941年，国民政府公开宣布与德、意断绝外交关系。针对当时德意法西斯承认汪精卫南京政权，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郭泰祺在重庆发表宣言，指出“德意”两国政府明知南京傀儡政权为日本军队一手造成，乃加以承认，实为加于中国之重大侮辱。两轴心国家此举，愈是证明世界侵略势力已结成集团，从事摧毁人类自由与文明。我国为维持自由与和平的国家，今断然与德意断绝关系。”并表示今后须“与各友邦尽力合作，继续奋斗，以完成反法西斯的使命”。宣言发表之后，中国驻德、意使馆立即撤回，这对德、意、日法西斯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对反法四斯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也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周恩来在巩固和扩大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他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分析了当时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详尽地论述了发展和扩大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重要作用，号召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团结起来，结成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集中力量打击法西斯集团。1940年9月20日，周恩来在重庆巴蜀小学广场发表了题为《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的讲演，他着重分析了人民普遍关心的九个问题，即：世界往哪个方向走？中国往哪个方向走？欧战向哪个方向发展？日本向什么方向发展？苏联保持什么立场？中国采取什么立场？日本能否结束中国事件？中国有没有严重的困难和投降危机？中国怎样才能抗战进步？最后他强调指出：只要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就一定能战胜各种困难，争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1940年12月23日，周恩来在重庆沈钧儒寓所会见了第四次来中国访问的美国著名作家斯特朗。1941年3月，周恩来在重庆热情地会见了国际援华医疗队罗马尼亚杨固大夫等人。1943年6月2日，印度医疗队巴苏大夫离开延安回国经过重庆，周恩来在红岩村会见了他，高度赞扬印度大夫们的国际主义和献身精神。

周恩来不仅亲自做外国人的统战工作，他还通过当时在重庆的中国劳动协会负责人朱学范对国际工人阶级做广泛的统战工作。朱学范多次出席国际劳工会议，并使中国劳协以全国性工会组织名义参加了国际工会联合会组织。

宋庆龄通过“保卫中国同盟”组织，也为中国人民争取到不少国家的援华救济团体和个人给中国的捐赠和其他抗战物资，为中国战时的外交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重庆人民的历史责任

积极参加抗日战争，争取民族的独立和生存是重庆人民在近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